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與釣魚台問題有關的中日琉球問題爭端及美國的介入調解，論文指導教授就是中國近代史及外交史的國際權威學者徐中約教授。

1972 年的夏天，我準備出發赴美留學。離港前夕，特向恩師王德昭教授告別，並謝謝他三年來教育之恩。臨別依依，他在我的紀念冊上寫了一些勉勵的話：「胡適之先生好以『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教人，此語我終身服膺，以為治史者尤當奉為圭臬以自律……」。德昭師這些話很明白地表示，真正的學問功夫，不能嘩眾取寵，亦不能敷衍了事，要有一個嚴謹的治史態度及方法，才能探求史事的真相。他的這番話，也成為了我日後在學術路上一直奉行的金科玉律，無日或忘。

第二章

飄洋過海 尋師問道： 美國研究院教育 對我的影響



第一節 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情況及教授陣容

香港是個中西文化及學術交匯的地方，記得我還在香港中文大學唸書的時候，對海外學人的學術報導文章就十分喜歡，原因很簡單：近年來歐美等地的中國研究風氣日趨蓬勃，學術活動活躍，很多消息及研究成果都值得在港及國內外的年青學者借鏡，作為參考。

在美國，以中國研究負盛名的學術機構之中，加州大學可說是執其牛耳。加州大學的校區分佈於加州各地，從北部的戴維斯及柏克萊校區，到南部的聖巴巴拉、洛杉磯及聖地牙哥等校區，可謂幅員廣大。上述各校園的中國研究課程都各有其特色，各有著名的教授坐鎮。

舉我就讀時的加大聖巴巴拉校區為例，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及外交史專家徐中約教授，即在此校任教。他的力作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的崛起》）出版後好評如潮，以其編寫態度嚴謹，論述客觀有理，獲學術界一致讚賞。他的有關中國外交史的專書，亦是權威性的作品，容後再作詳細介紹。這校區在我就讀時負責傳統中國史研究的是陳啟雲教授，負責中國政治及外交關係的是劉平鄰教授，都是著述豐富的中國研究權威學者。當然，中港台俱知名的白先勇教授，亦是在聖巴巴拉校區教授中國文學及語言課程。此外，還有多位美國及日本教授



※ 與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UCSB）校長 Vernon Cheadle 合攝於畢業典禮上

任教，學術氣氛十分濃烈。

洛杉磯校區亦是人材鼎盛，當時負責教授中國近代史的是黃宗智教授，教授佛學的是陳觀勝教授，還有中國語文部的周鴻翔教授等。而亞洲圖書館的藏書也很不錯，是我經常探秘的地方，因兩校之間每天都有校巴往來。

比較上，戴維斯校區的中國研究學者較少，但有以研究近代中國史負盛名的劉廣京教授坐鎮，而且訓練出一批十分出色的博士生，他與我後來亦有很多聯繫。

在加大各校區中以研究中國最具規模及歷史最久的，當推柏克萊校區。我在 1980 年的夏天，應該校中國研究中心

之聘，特別來這中心任客座研究員，逗留了三個多月，受益良多。

以教授及藏書的情況而言，柏克萊校區的陣容最盛，除各學系部門外，尚設東亞研究所，內分中國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及韓國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所長為研究東亞政治出名的 Robert A. Scalapino（施樂伯）教授。著名的教授還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 Frederic E. Wakeman（魏斐德）教授。至於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則為 Lowell Dittmer（原武道）教授，他是以研究劉少奇及文化大革命出名的。

我在該中心客座期間，頗常與原武道教授討論及閒談，他曾對我表示，他怎樣也無法預測到劉少奇會在死後得到平反。我在該中心發表了演講及研究報告，與該校區的教授及研究員互動甚多。

加州大學現在仍是在西方世界裏研究中國問題的重鎮及翹楚。很多新的學者，也取代了已退休或離世的老教授，努力把中國研究繼續推向另一個新高峰。

第二節 研究院的學術氛圍與我的恩師戴康德教授

(Alexander DeConde)

我決定往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升學，與選擇指導教授

為師的因素有絕大的關係。因為研究生的學術興趣與指導教授配合與否及老師的學術聲望與地位，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研究生畢業後的發展及路向，特別是在工作出路方面。

在美國研究歷史學，與在亞洲的情況不盡相同。在中港台及亞洲各地，歷史學多偏重於比較單向的人文科學，與西方把歷史學歸納為社會科學，取向甚是不同。在美國研究歷史，是以一個科際整合（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的方法來分析歷史。換句話說，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及分析歷史的發展，例如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不同的專業角度來探討，這與以前通常偏重於單以人文學科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有顯著的不同。

我專攻的外交史，其實是一門很冷門及困難的學科，因為牽涉多個國家的歷史及其外交問題。博士班課程規定要唸多種外國語言（特別是法文），當然我懂中文及日文佔了一些優勢，此外又要唸國際關係及國際公法，與及有關的國家歷史等等科目，唸起來十分吃力，而外交史也變成了政治學與歷史學的混合體，但這對我的研究及日後的教學卻是裨益甚大。

我在研究院的碩士導師是戴康德（Alexander DeConde）教授，他是美國外交史的權威。而博士導師是徐中約教授，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的權威。兩位教授都是鼎鼎大名及著作等身的國際級學者，我接受他們教導之餘，也深深地受到他們





※ 恩師戴康德教授
(Alexander DeConde)
的官方照



的學養及嚴謹治史的態度影響。

我在碩士導師戴康德的教導下，國際關係史的研究已衝出傳統的外交層次，而擴闊至中外的教育及文化交流的層次，因戴康德師認為，教育與文化層面是對外關係的第四個重要因素（其他三個為外交、政治、經濟）。從此，我的興趣除了在外交層面，也擴大至中西文化的交流、衝擊與整合，因為在中國的現代化及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外文化如何融合是一個很大的關鍵，我後來也出版過幾本書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的碩士導師戴康德是意裔美國教授，1920年11月13

日出生於紐約州，是美國外交史的重量級權威學者，他在史丹福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史丹福、密歇根及杜克等大學執教，1961年赴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歷史系任教至1991年退休，2016年5月28日在加州辭世。

戴師著作等身，共出版有二十多本專著，例如《美國外交政策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美國外交政策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族裔、種族與美國外交政策》(*Ethnicity, R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等。他並成立「美國對外關係史學家學會」(*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及出任創會會長，是國際級的著名學者，慕名而來跟隨他學習的碩士及博士生絡繹不絕，很受學生們的歡迎。

我十分慶幸戴康德教授擔任我的碩士導師，成為我在美國接受春風化雨的恩師。他的教學用啟發性的方式，引導學生去思考及分析問題，循循善誘，使學生們獲益良多。他還經常帶研究生往他的家中上課，以紅酒、芝士餅食及意大利麵條招待，在一個輕鬆而開放的環境中進行無拘無束的學術討論和學習，學生們十分喜歡及欣賞。對我而言，更是一種在知識層次上的無比衝擊及洗禮，讓我的學術視野可以得以擴闊及提升。而作為戴師當時的唯一華人研究生，他對我也是特別關注及照顧。

碩士課程是要撰寫碩士論文才能畢業，而且一定要在兩年內完成所有課業及論文的要求。選擇什麼碩士論文題目來撰寫是一個關鍵性的決定，除了要和導師的專業及自己的興趣配合之外，更要選擇一個對自己研究有利及有優勢的題目。由於戴師主張對外關係的研究是包括文化及教育的層次，於是，在這個啟發性的指引下，我選擇了「容閔及留美幼童」這個中西文化及教育交流的首個歷史性試驗作為題目來寫我的碩士論文。容閔是美國大學的第一位華人畢業生（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他後來帶領一百二十名首批中國幼年官費學生赴美留學（史稱「留美幼童」），向西方學習，這在中國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特別是從中西文化的碰撞及融合的角度而言，而這篇碩士論文的研究及撰寫，也從此把我帶進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領域上。

為了撰寫這論文，我除了翻查中國史料及留美幼童後來撰寫的自傳及文章之外，也盡量找尋幼童與美國同學的往來書信及照片等，結果發現華盛頓州州立大學的圖書館內典藏大量這樣的資料，另外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市（Hartford, Connecticut）的公立圖書館及耶魯大學的圖書館內都藏有這方面從未面世的原始史料可供應用，這些發現令我大喜過望，就這樣，我利用大量的中美原始資料，糾正了容閔後來被中譯的自傳《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內的種種錯誤。論文完成後，獲戴師的讚賞及各位碩士委員



會老師一字不改地一致通過，順利取得碩士學位。而我發現的幼童留美珍貴資料，後來有不少的國內外學者繼續引用，高宗魯教授並翻譯成中文出書，媒體亦爭相拍攝紀錄片報導，造成一種中美文化交流的氣象，令我內心感到無比的欣慰。

我的博士導師是譽滿國際的徐中約教授，下文會有詳細介紹。他研究外交史的特色，是運用「多種語文」（Multi-lingual）及「多元檔案」（Multi-archival）的方法來處理及研究外交史問題。這樣的研究方法，會得到較客觀及較全面的研究結果。

在徐師的指導下，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日、美三國對琉球問題的國際外交爭端。為了要寫好這篇博士論文，我要踏遍中國、台灣、日本、琉球（沖繩）及美國各地圖書館和檔案部去尋找及翻查資料，才能從多角度去客觀分析問題的重點並加以評論及下結論，論文中引用了不少新的史料來反駁一些傳統中外學者對琉球問題的看法。論文完成後，我的幾位博士論文委員會導師都表示十分滿意，並一字不改地通過，後來更以專書形式出版，深獲學界好評。

碩士班是二年制課程，碩士課程後，我用了三年半的時間，並以全 A 的優異成績取得博士學位，因而還未到二十八歲，我便畢業並順利取得美國大學教席，出任助理教授職位。